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一辑〕

经典的背景

李骏虎·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ress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一辑〕

经典的背景

李骏虎·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典的背景 / 李骏虎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0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1辑)

ISBN 978-7-5378-4462-8

I. ①经… II. ①李… III. ①乡土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8964 号

书 名 经典的背景
著 者 李骏虎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427866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37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5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462-8
定 价 38.00 元

《赵树理研究文丛》编委会

主 任：杜学文 张志仁

成 员：赵魁元 杨占平 傅书华 和 悦

续小强 宋丽云 贾大一

主 编：赵魁元 杨占平

总序

赵魁元 杨占平

赵树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人民作家，是20世纪大众化文学的领军人物，在国内外具有非常广泛的知名度。他所实践与倡导的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为普通人写作的文学态度，曾经影响了几代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赵树理出生在太行山区，虽然没有置身于北京、上海等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但也分明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疾风骤雨同样对赵树理年轻的心灵产生了强烈冲击。这让从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影响的赵树理，能以一种民间姿态、“草根”意识来思考问题；而新文化关于自由、平等，关于科学、民主的追求，又使他比一般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了对既有一切的不满。于是，在赵树理身上形成了一种“我即是民”“民即是我”，“民”与“我”一体的思想观念。他企望改变中国现实的追求既是改变普通民众命运的努力，更是改变他自己个人命运的努力。

赵树理几十年深深融入农村社会现实生活中，与广大农民群众休戚与共，自觉地把自已当作农民中的一员。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群众能够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村政策有失误，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农民的甘苦即是他自己的甘苦，农民的冷暖即是他自身的冷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他不像某些知识

分子那样，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常常站出来指点江山、布坛论道，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他要用自己回归到民间，回归到农民之中的实际行动，表明一个作家的态度。

赵树理继承“五四”文学传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勇于在创作中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时，他从民间艺术和古典小说中汲取营养，创造了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现代小说样式和艺术语言。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是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我们说，赵树理的创作，完全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他身处中国图新求变，努力改革落后面貌的十分特殊的时代，在他人生道路和作品中，折射出普通中国人追求幸福理想、改变自身命运的奋斗历程和精神情怀。

今天，文学已经进入21世纪，但赵树理所奉行的做公众的代言人和文学的现实性、人民性、民族性精神，依然有着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依然值得广大作家、艺术家学习，更值得广大理论家研究。

因此，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在赵树理诞生110周年前夕，隆重推出《赵树理研究文丛》，这是近年来研究赵树理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应当尽到的职责。这套丛书的作者，有供职在各级文联或作家协会的评论家，有大专院校的教授，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赵树理做了深刻而广泛的研究。或许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尽相同，但都是对赵树理研究的开掘，都有可取之处。

我们认为，关于赵树理的研究与写作，同文学创作一样，也是因研究者的身份和习惯各有特点各具风格的；但是，从这套丛书中也能够体现出一些共性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有独创性。我们感受到，近年来的赵树理研究，随着研究者对作家资料掌握的丰富多元，也慢慢形成了各自比较明显的观点。作为一种讲求逻辑推理性的思维活动，不少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已经从过去只懂得同向性思维逐步向逆向性思维转化。同向性思维往往在研究赵树理的人生经历和作品时，只能跟在作家或作品之后做一些浅层次的阐释，比如，说

赵树理已经体现在作品中的主题、典型人物有什么特点、艺术表现方式是哪种等等，而这些却是作家和读者都大体上明白的事实。然而，逆向性思维则可以充分表达出研究者的独特之处来，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是通过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进行反经验的批判性思考，得出一些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与众不同却具有创见性的结论来。这种研究用独到的眼光，评判、分析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各种内在的和外部的蕴含成分，对公认的和传统的结论提出怀疑，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正是如此，才体现出研究者的独创性来。

其次是有真情实感。我们常常感到，当今的某些理论家做作家作品研究时，存在着一种浮躁现象，他们从事文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拿到某种学位证书或专业职称，很少去发掘课题的深层次意义。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外在的社会因素，更有研究者本身内在的意图，而这种意图的核心，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真诚的感情。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赵树理研究界，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尤其是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满怀真情实感在研究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面对一辈子真诚做人、真诚处事的赵树理，面对赵树理决不违心写作的经典作品，研究者们都是用真诚的感情去研究。没有倾情付出的研究者，其文章也只能是精神涣散的体现，枯燥文字的堆积。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具备了真诚的感情，能够体验到赵树理的内心世界，体验到赵树理作品的本真之处，写出的文章不能说篇篇是精品，但都是有见地有思想的作品。

第三是立足现实。应当说，关于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研究的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研究者价值的尺度。我们强调现实性，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赵树理及其作品与当下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进行价值评定，关键是要能用当下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艺术标准去评判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并且能得出独到的看法或结论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可以说是具有了现实性了。之所以说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赵树理研究者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如果你的研究还停留在以往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新鲜的。一种不新鲜的结论，自然是难有多少价值让人们接受

的。由此可见，现实性是研究的灵魂。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秩序向规范化发展，文学逐步回归到了自己的应有位置，文学研究，包括赵树理研究也逐渐从尴尬境地走了出来。眼下，作家的创作显得相对轻松；研究者也随之放松了心态，在解决了自身知识积累和生存问题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研究和评论，个性得到了相对充分的发挥。应当说，当下的文学研究已经进入比较宽松的环境，对中青年研究者的成长是有益的。我们希望广大有志于赵树理研究的同行们，能够静下心来，不断更新观念，吸取新的研究方法，把赵树理研究推向全新的阶段。

这套《赵树理研究文丛》的出版，得到了山西省委宣传部和晋城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真诚配合，北岳文艺出版社相关领导和责任编辑做了认真的编校工作，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二〇一五年八月

坚信那个写《桌面》的作家会出大名的

我常常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块写小说的料儿？直到慢慢发现，好的创作状态和作品，不是出于脑子，而是源于心灵。

有研究表明人的心脏是参与思考的，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血泵。若干年前看到这则小小的奇闻，我是当作科普知识记住的。多年后我却在写作实践中笃信了这个说法。

无知者总是无畏的，和后来不同，我开始学写作的时候，是自信满满的。一个人一生会从事什么事业，有宿命的成分，也有外部条件和自我性格的因素在内。我会折纸片儿往地下甩，和人斗输赢的时候，还认不得几个字，但颇有些想成为文化人的萌动，为此，我趴在炕沿上，把父亲的藏书《水浒传》《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著）翻开，一页页地翻看，找到没排满的半页或者大半页空白纸，就用小刀子仔细地裁下来，然后从祖母的针线筐箩里翻出针线来，让目不识丁的祖母帮我装订成本子，打算在上面写点什么。祖母望着被我裁得七零八落的两本厚书，很担忧地警告我：“也不知道你爸这书还有用没用，你把人家的糟蹋成这样，看挨打的日子在后面！”这件事情说明，我从一开始就是个爱搞花架子的形式主义者，但具有挑战权威无视经典的勇气。

父亲有没有因为我破坏了他的书打我，我不记得了，好像那个时候他

也顾不上这些，当时正是文学狂热的 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村委主任的父亲，是方圆村里甚至整个甘亭公社最有名气的“写文章的”。和他一样为文学疯狂的还有本村的一个农民好友，三十年后，父亲早放弃了文学，而那位跟着他学创作的叔叔至今还在写当年流行的“一袋烟小说”。每到下雨天，不能下地干活儿的时候，那位叔叔就会带着他的儿子来我家，他儿子和我在炕下“打纸片儿”，他和我年轻的父亲爬在我家土炕上研究“故事结构”，我忙里偷闲望了一眼他们的表情，他们面色庄重，一定是在商议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支起耳朵，听到他们讨论一个人在公园里把手表丢了，是应该丢在长椅底下，还是应该丢在池塘边的草丛里。为此两个人讨论到掌灯时分都没有定论，他们父子还在我家吃了免费的晚餐。及长，我想起那个情景就纳闷儿，两个没去过大城市的泥腿子，怎么会知道“长椅”和“池塘”的呢？

再后来就有点明白了，为了学习创作，我父亲经常骑着公社奖给他的自行车去临汾（当时是行署所在地）的邮政局买文学杂志，以至于攒了满满几大柜子《人民文学》《作品》《青春》《汾水》（《山西文学》前身），家里到处扔的都是文学杂志。他们关于公园的那点想象，一定来自于刊物上别人的小说。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所以他们最后没有成为作家。我曾不无遗憾地想过，假如当时父亲他们能有条件和视为神圣的“山西文坛五老”——马峰、西戎、束为、孙谦、胡正见一面，哪怕说上一分钟话，马老告诉文学青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那父亲他们也许就会被一语惊醒梦中人，知道要从生活而不是从别人作品当中去寻找素材，知道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那现在也许就跟李锐、蒋韵老师家的笛安一样，成为“文二代”了。这绝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大概二十年后，我在山西日报社做副刊编辑，就有幸结识了马老和胡老，马老在他给我的若干便签中提到的最多的就是“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我就代替我父亲成了作家，圆了他的梦。

父亲和那位同好叔叔没有实现文学梦想，他们失去了文学但是留下了梦想，这使他们成为晋南传统农民中的异类，他俩不安心种地，北上太原城，买回蘑菇菌种，搞家庭经济，就在我家新瓦房的堂屋里搭起架子、覆上塑料薄膜来养蘑菇，结果弄得菌丝乱飞，一家老小“吭吭咋咋”咳嗽了整个冬天。后来我父亲还当过养鸡专业户、种棉大户，熬过糖浆，种过果树，兴冲冲地转移着他未遂的文学理想，没对生活改善多少，倒是赚来正经农民的冷嘲热讽，他们说：“看看人家保玉，看着书本种地哩，也不是知道他日哄地，还是地日哄他！”父亲却始终不渝，不为所动，几年之后，他科学种田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当年嘲笑他的农民每到节令总是手足无措地登上我家的门，毕恭毕敬地向他请教：“保玉，你看下半年种什么保险呢？棉花上的红蜘蛛应该打什么药？”而此时父亲对堂屋里那个黄色的柜子看守得也不那么严了，我偷偷用砸扁的铁丝撬开了柜门上的锁，结果大失所望，没什么值钱的宝贝，满柜子全是硕大厚实的牛皮纸信封，上面打着红色的印戳：退稿！我打开一个，抽出来，是厚厚的一沓信纸，第一页上用蓝色的墨水恭敬地写着“短篇小说，马房院的故事，李保玉”呈“工”字排列。有一次在给家里养的牛铡麦秸的时候，我问起这件事，父亲很自豪地说：“那个小说已经通过了二审，三审没通过，差点就发表了！”退稿的是山西作协的《山西文学》编辑部。父亲还饶有兴味地跟我谈起当时山西文坛红极一时的“两座石山”，他还知道韩石山曾在汾西当过教师，最有名气的小说是发在《山西青年》上的《行路难》，而张石山的短篇小说《铍柄韩宝山》获了奖。有意思的是新世纪之初山西文学院让专业作家和签约作家“结对子”的时候，韩石山老师成了我的导师，而张石山老师如今经常和我一起参加文学活动，父亲却对文学和“两座石山”都失去了兴趣，他含饴弄孙，整日忧心的是在北京工作的我弟弟马顿买不起房子。

被父亲冷落的文学杂志，后来成了我的课外读物，印象最深的是在《人民文学》上看到的张贤亮的《灵与肉》，插图像题目一样触目惊心，可惜

当时看不懂写的是啥意思。有一天放学后翻阅一本掉了前后封皮的杂志，看到一个叫贾平凹的作者写的短篇小说《桌面》，不长，一读就读了进去，被感动了，觉得写得好，有了模仿的冲动。后来的若干年里，我一直坚信那个写《桌面》的作家会出大名的，现在看来，我十一岁那个时候眼光就很准，还是有点艺术天分的。

他大声喊出：“陈染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我没有问过父亲，他是否真的读过《水浒传》和《吕梁英雄传》，还是因为被我把书剪坏了没钱买新的。我却是直到1995年二十二岁的时候都没有读过一本像样的外国文学名著，此前最可炫耀的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在看瓜棚里就着马灯读完了八卷竖排本的《红楼梦》，夤夜读到“昨夜潇湘闻鬼哭”，灯影摇曳，瓜棚外枯叶在风中哗哗作响，顿时寒毛倒竖。为了添补学费，我从十四岁上学做瓜农，每天晚上在瓜棚里看瓜，早上就用小平车拉一车西瓜和甜瓜去军营门口的国道边摆摊儿，支一张小饭桌，上面摆着一个最大个儿的西瓜做招牌，西瓜底下用草圈儿垫着。好歹是个读书人，嫌丢脸，就让我八岁的弟弟马顿坐在桌子后面的小椅子上，我在平车后面铺块麻袋片儿，躺在上面看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有人来买瓜了，弟弟就喊我一声：“哥，别看书了，出来称西瓜。”我就抖擞精神像个老手儿一样出来和人讨价还价，抡起西瓜刀打开个三角口子，很自信地对买主说：“看，沙不沙？——都说了不沙不要钱嘛！”

那个暑假，我深深地爱上了美丽婉约的知识女性丁洁琼，为她哭得稀里哗啦，为她多年梦绕魂牵，虽然那本《第二次握手》最后一页没有了，却给我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三十年后在网上看到老作家张扬打人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管张扬做什么都无可厚非，因为他写过《第二次握手》！

如愿考上中专后，我保持了在初中时给报纸副刊投稿的爱好，这样在补贴生活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女同学的青睐。但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我是没有任何理论概念的，我不自信的原因是上初中时学校很有名的弄潮文学社竟然不吸收我当社员，我假装不屑，其实是那么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在那本油印刊物上发表。我不被吸收的原因是我的作文总是不能符合要求，喜欢胡思乱想，比如那年春天下雪了，老师让赞美雪景，我却想起来村里的老农常说的一句农谚：“冬雪皆宝，春雪皆草”，我就写了很多春雪的坏话，以为老师会表扬，结果招来他很多白眼儿。后来我父亲终于不能安心当农民，他报考了《山西青年》办的“刊授大学”，“八七版”《红楼梦》里演黛玉的陈晓旭当时也是学员，有一期《山西青年》的封面明星就是她，梨花带雨、楚楚动人如黛玉附体。父亲靠着文学青年的底子获得了刊授大学的结业证，被公社一位独具慧眼的领导看中，要他去做党办秘书，在此之前，安排他去《临汾日报》副刊做实习编辑。父亲就辞了别人眼热不已的村党支部书记一职去报社实习，数九寒天，戴着一顶雷锋式的“火车头”棉帽，蹬着自行车顶着呼啸的西北风每天天不亮出发，太阳下山才回来。而我却不得不跟着母亲去地里拉棉花秆儿，那是一个冬天做饭和取暖的燃料。正是父亲在报社做实习编辑的时候，他鼓动我学习写作，把我写的寓言故事和诗歌拿到副刊“新芽版”去发表，让我获得了最初的文学声名，感受到了作品发表后的愉悦和自信。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认识到在中国的文坛混，除了写得好，还得有人脉。

我读书的山西省广播电视学校听起来是个文艺类学校，其实是货真价实的理工科中专，也许图书馆是有不少典籍的，但我可怜的文学才情此时正值志大才疏不得其门而入的阶段，根本不知道该借什么书看，也基本看不进去什么西方经典。混了四年，记得借过的书就一本《冰心散文集》，而真正通读也读懂了的就是小仲马的《茶花女》，还是因为对妓女爱情的猎奇才被吸引。但我听说真正会写小说的人，读书都是不多的，你的生活和

你自身的感知就能完成好作品，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就是这样如有神助般完成的。当时常借些杂牌文学杂志来标榜自己的文学理想，受到一种类似当时流行的电视剧《辘轳·女人和井》这样风格叙事的影响，在于我如对牛弹琴的电工电子课上，百无聊赖时，动手把一个小时听来的民间故事改写成小说，不知被故乡的什么鬼魅附体，居然就写成了。寄给了《山西文学》编辑部，然后就忘到了脑后。一个下午，正和同学在操场边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打球，同学捎给我一封薄薄的白色信封，是山西文学寄来的，我顿时有福至心灵的感觉，觉得事情成了。拆开看，果然是《山西文学》的编辑祝大同老师约我去编辑部做个小改动，那封信祝老师写得龙飞凤舞，很多字我不认识，但还是看懂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那条巷子对于我和所有文学爱好者一样云山雾罩的，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有朝圣的感觉。见了面才知道，祝老师约我来的意思，主要不是为改稿子，他要看看这个把小说写得鬼气森森的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是个毛孩子。他很隐晦也很艺术地问我：“你这么小，那些描写男女性爱的经验从哪里来的？”我说：“夜场录像厅的毛片。”他恍然大悟，长长地“哦”了一声。

但或许我是搪塞了他，因为那个年代有两个轰动全国的文学事件，一个是路遥的去世和《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一个是贾平凹的《废都》因为里面的那些个空格成为禁书。《平凡的世界》太厚，我当时没顾不上看，盗版《废都》却是窝在被窝里拿手电看得快流鼻血了，很难说我不是身心都受到了贾平凹那些个空格的影响。

就这样，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清早的阳光》发表的时候，祝老师在“编者手记”中表达了发现我的惊喜，表达了对这部小说的惊奇，同时也表达了我昙花一现的担忧。很不幸被他言中，我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作品都没有达到《清早的阳光》的水准。

毕业回到故乡，临时在县报社工作，我流着眼泪读完了路遥《平凡的

世界》，第一次感受到文学作品给予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但也从那句“早晨从中午开始”，知道了当作家其实是一件艰辛的事业。为了继续自己的文学热情不灭，我用稿费创办了一个小印刷刊物《文学爱好者》，像个山大王一样扯起文学大旗，乌合起二百左右喜欢写作的男女啸聚山林，自己写自己发，拖欠的印刷费托国家颁布《破产法》的福，县印刷厂改制时才被清零。想起初中时曾在日记本中写下豪言壮语：“我的理想是成为文学家，我的理想职业是文学编辑。”不承想把个理想落实成眼下的情形，不禁感到万般凄凉。当时的环境中，没人和我畅谈文学，没人指导我阅读，也没人交流创作方法，就像在黑暗里摸索着行走，不愿意承认创作上穷途末路，却无计可施。这个时候，从晋东南师专毕业回来一个叫乔文波的家伙，自称中文系毕业，一副文艺青年的形象和文学大师的气魄，可惜他只是个实习生并且一文不名，我就让他做了《文学爱好者》编辑部的主任，让他替我看稿子干活儿。一个晚上，我带着一箱方便面去他寄居的县委大楼宿舍里想和他谈谈文学。他飘洒着乌黑浓密的过耳长发傲慢地问我：“你看过《百年孤独》吧？”我压根儿没听说过是个什么东西，他不敢相信地说：“你不会连马尔克斯也不知道吧？”我说我当然知道，但看过太久，忘球了。他从枕头下拽出一本不太厚的绿皮册子说：“你拿去看吧。”——那是我第一次触碰到《百年孤独》，那本影响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内的无数中国作家的盗版书。可惜我对它是免疫的，因为我底子太薄了，不足以被他调动写作欲望，而且我写的《清早的阳光》基本上也是魔幻现实主义那一套，读《百年孤独》只是充当了我后来炫耀自己文学修养的谈资。

就是从乔文波嘴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当时中国文坛三位响当当的女作家的名字：池莉、方方、陈染。她们被相提并论，排名先后也是乔氏所为，但他最爱陈染，他有一个十六开笔记本，上面大段大段抄写着陈染的小说——因为家寒，他买不起杂志，只能跑到图书馆抄写——他激情四射地站在地下给我朗诵陈染的小说，并且很暧昧地提到一个情节，大概就是在

夜晚的出租车后排座上，一个女人在给一个陌生男人口交。让当时尚是童男子的我瞠目结舌心乱如麻。读到高潮处，他大声地喊出：“啊，陈染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李巍期望把我打造成中国的杰克·罗琳

我此生最引以为豪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1997年倾尽所有的积蓄为我弟弟马顿付了一半上大学的学费，并且尽我所能为他提供生活费用，最后的结果居然是拯救了我前途渺茫的文学梦想。山西师大中文系97级的大学生马顿，听了一个学期课后发现他自诩为作家的亲哥哥其实对文学的认知少得可怜，他像个导师一样把课堂上听到的大师作品买上几本，带给他可怜的哥哥恶补，换取不足的生活费。马顿是个爱书的娃，他把在校门口的儒林书局买到的名著都认真地用画报包上书皮，然后在书脊上用他古怪的字体写上书名和著者。在他买给我的一堆书中，有一本是王永年翻译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小说集》，很多名著我怎么都读不进去，但这一本很舒服地就读下来了，而且获得了洗礼般的快感和享受。博尔赫斯，这个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的盲眼老人，在小径分岔的文学花园里，用他的拐棍儿为我指引了第一条通往世界文学殿堂的小路。

正是1997年，一位青年作家的死亡轰动了中国文坛，马顿适时地把他的《时代三部曲》带给了我这个在小县城里耳目闭塞的哥哥。像当时很多文学青年一样，我一下子就被吸引并且打开了。从1997年第一眼看到王小波的作品，直到2007年的十年间，我几乎所有的中篇小说都是模仿王小波先生风格的，有八篇三十万字，我是多么的迷恋和敬仰他啊。记得2007年编辑中篇小说集，心中充满了怎样的温暖和欢悦啊，我像那些续写“红楼”的痴人，只为翻烂了原著，只觉得还意犹未尽，索性自己写给自己看。于是，就有了那本向王小波先生致敬的《李骏虎中篇小说集》。我是个无趣

的人，是从王小波的作品里硬生生地体味到什么叫作“有趣”，我几乎拥有他所有版本的作品，那几年里，家里到处扔的是“黄金”“白银”“青铜”“黑铁”，随便坐在沙发上，靠在床头，或者蹲马桶上，抄起一本来，无论翻到哪一页，都能立刻读进去，嘿嘿地笑起来。坐在山西日报社的花园里捧读《红拂夜奔》，我埋着头“呵呵呵呵”没完，几乎被人疑为脑子有病。每天捧着一个本子，铺张报纸在大楼背后的角落里练习“王小波体”。其实，我最钟情的是《万寿寺》，我的第一个中篇《雪落的声音》几乎就是临摹着它写的，洪治纲老师还写过一个很长的评论。我知道了早晨的雾气可以用扯开的棉絮来比喻，我知道了天空垂下来，像一颗没有瞳仁的眼珠子。一部《黄金时代》足以代表王小波，但《青铜时代》的《寻找无双》《红拂夜奔》《万寿寺》，则真是王小波的“世界奇观”，无人能及。

我认为，评论界把王小波的小说界定为“黑色幽默”是浅显的，实际上，王小波的创作已经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荒诞。小说中的讽刺意味与苦涩的幽默结合在一起，通过不确定的时空和人物来表现作品思想内容，将现实中的具体人物抽象化。他的小说已经达到了“在故作平淡无奇的日常形式中表达出反常的内容”，使不受制于现实的事件，显得“比真正的生活真实还要现实”。在当代中国作家里，无出其右，莫言也难望其项背。

1998年的冬天，我到太原应聘山西日报的编辑，考完后到当年读书的山西广播电视学校门口的报摊买了一本黑色封面的《大家》，一个人在永济饺子馆就着素鸡和皮冻吃饭时，翻开其时影响巨大的《大家》，看到上面残雪等名家的小说，我暗自叹气说：“这辈子能在《大家》发表一个短篇小说就足矣了！”没想到转过年来，我就在出租屋里接到了一个南方口音的电话，他说，他是《大家》的主编李巍，我寄去的小说决定发表，并且希望我再给他两篇小说和一张艺术照片。第二天早上，我6点钟爬起来，一天没吃没喝也没上厕所，一直在我的旧电脑前坐到晚上6点，十二个小时完成了一个中篇一个短篇，然后跑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意气风发的艺术照。